

历史变迁中的阿勒泰

□ 许建英

新疆阿勒泰地区地处阿尔泰山南麓和准噶尔盆地北缘，面积为 11.8 万平方公里，内辖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富蕴县、福海县、哈巴河县、青河县和吉木乃县。阿勒泰之名称自阿尔泰山，为蒙古语，意指黄金和金色。阿尔泰山古称金微山或金山，清代誉之为天山北路“名山之冠”，“山前后物产饶裕、水草丰美，久为中外各部落所艳羨”。历史上的阿勒泰地区，不但是中国北疆民族游牧、驻屯和设立牙帐之所，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新疆自古以来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缩影。

历史上中央政府对阿勒泰地区的治理

西汉初年，中原王朝就开始经营北疆地区，张骞凿通西域强化了西域和北部边疆的联系。自汉代起，阿尔泰山区域就是维护西域安全稳定的战略要地，其中今天阿勒泰地区尤为重要。正如清人所论，阿勒泰是“漠北全疆右臂”，而今之阿勒泰地区则起到防护新疆的重要作用。纵观历史，中央政府强大时，为确保西域安全稳定，就会对关系天山北路安危的阿勒泰地区加强管理，屯兵建置；中央政府衰落时，北疆阿勒泰地区等地常为部族政权割据，作为南控西域和东进漠北的要地。因此，阿勒泰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中央王朝塞防的藩篱、北方游牧民族前出基地和迁徙通道的多重角色。

自唐代起，中央政府开始对阿勒泰地区实施有效管辖。唐在西域和漠北建立严密的军政管理体制，比汉朝更有效地征兵和应对战争，其中设置羁縻州府是唐代治理边疆的重要举措。649 年唐太宗在庭州设立瑶池都督府，不久分为昆陵和濠池二都护府，并将阿勒泰地区纳入辖地，设立狼山州。657 年苏定方先后大败西突厥，恢复唐朝对西域的统治，并于 659 年设立金山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金山以西、两河流域以东的广大地区。702 年唐朝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阿勒泰地区为北庭节度使辖区羁縻州府所管辖。

宋辽金时期在金山游牧的黠戛斯等部臣服于中央王朝。1124 年，西辽在阿尔泰山设立西部招讨司并在乌伦古河流域屯垦，隶属上京道。1204 年，成吉思汗率兵攻灭乃蛮部，占领阿尔泰山

两侧，并将阿勒泰地区分封给窝阔台。窝阔台汗国被灭后，阿勒泰地区为阳翟王部，科布多一带为称海宣慰司，北面为八邻万户和益兰州等部断事官辖地，后进入元朝中央政府岭北行省版图。明代，阿勒泰地区为斡亦刺惕部游牧地，即卫拉特（瓦剌）蒙古部管辖。

清朝消灭准噶尔政权后在阿勒泰地区实行军府制度，以边防军务为主，兼管屯垦。1761 年，清朝设立科布多参赞大臣，阿勒泰地区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受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节制。1867 年，清朝将塔城参赞大臣移驻布伦托海，并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兼理塔城和阿尔泰两地事务。1869 年裁撤布伦托海办事大臣，阿勒泰地区仍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1903 年，伊犁将军长庚在与科布多、迪化、伊犁、塔城四方商妥后，确定将阿尔泰建成单独行政区。1904 年，清政府将科布多参赞大臣之副职科布多办事大臣移驻阿尔泰承化寺（在今天阿勒泰市）视事，锡恒为首任办事大臣，辖阿尔泰乌梁海、新土尔扈特与亲和硕特三部之地，此为清朝实行科布多与阿尔泰分治的开始。1907 年，阿尔泰正式由科布多划出，成为一级行政区，奠定了今天阿勒泰地区的基本区划范围。

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从蒙古高原到黑海之滨存在着一条古老的商道，这条商道由多个支线组成，或经过中蒙边境的一些大坂，进入新疆布尔津河上游和克兰河上游，进入额尔齐斯河；或由开尔根鄂博、巴彥毛德尼布拉格翻越阿尔泰山，进入布尔根河上游及乌伦古河；或向南穿越将军戈壁，进入新疆奇台县；或抵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后，沿河西行入塔城、博乐、伊犁河谷，随后抵达哈萨克斯坦。这些线路所汇成的商道就是草原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的时间久远。早在公元 7 世纪初，《新唐书》就记载阿尔泰山地区游牧民族妇女服饰使用“红绢”“霫锦”，可见中原丝绸当时就畅销此地。《新唐书·黠戛斯传》记载说，从阿拉伯地区经由波斯到新疆吐鲁番和吉木萨尔、阿尔泰有一条丝绸贸易商

路。隋代裴矩在其撰写的《西域图记》中则明确指出，由中国通向地中海区域的商路“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其中，“北道从伊吾（今新疆哈密），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铁勒部、突厥可汗庭（今巴尔之南），渡北流河水（今锡尔河），到拂林国（东罗马）达于西海（地中海）”。学界研究认为，这条经巴里坤西抵地中海的北道，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存在了。阿勒泰地区曾经由铁勒等民族居住，加上盛产黄金，因此商路经由此地，成为联通中亚草原和蒙古高原的节点。例如，文献记载铁勒就针对很多西域商人到中原做生意的情况，遂利用其占据草原丝绸之路要津的优势，便“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

草原丝绸之路在阿勒泰地区境内也有多条重要的支线，大体可分为东南道、东道、北道、西道、南道五条。一是东南道，即以新疆巴里坤为门户，经木垒、古城、将军戈壁、哈拉玛依勒山、红柳沟、野马泉、萨尔托海和青河。二是东道，即以科布多为门户，形成青吉线（青河县至吉木乃，再通往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斋桑及卡拉干达）、青布线（由青河县到福海县的布伦托海，复经和布克赛尔、塔城，由阿拉山通往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三是北道，即由达英湖为门户，进入乌尔莫盖提，且由乌尔莫盖提进入乌契力克、小克兰河、阿勒泰、齐伯渡、布伦托海；或由乌尔莫盖提进入耶戈阿什、沙勒凯尔、加斯卡拉盖、阿勒泰、齐伯渡、布伦托海。四是西道，亦新疆吉木乃、哈巴河口岸为门户，联通青吉线和青布线。五是南道，即由阿勒泰至乌鲁木齐、富蕴县至乌鲁木齐构成。由于游牧部落广泛分布于蒙古高原、天山以北以及今天中亚等地，其往来十分密切，形成草原丝绸之路，而以上述五条重要贸易路线及其繁忙的贸易场景，促使阿勒泰地区成为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多元文化交融互鉴之地

地处草原丝绸之路节点的阿勒泰地区，历史上始终是游牧民族大迁徙大交流的重要区域，造就了其文化多元性和

融合性特点。

近年来，阿勒泰地区发现通天洞史前遗址。考古发掘表明通天洞遗址是跨时代的文化堆积，该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通天洞遗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反映出早期人类迁徙与文化交流，说明阿勒泰地区与塔尔巴哈台之间较平坦的山谷在旧石器时代就是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的通道。从历史发展来看，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女真人、鲜卑人等都在阿勒泰地区建立过政权，族群之间有着深厚的人文联系与浸润，众多出土文物以及人文演变都充分体现出这些特点。

阿勒泰地区发现众多文物具有融合性特点，例如岩画就是如此。阿勒泰地区多处发现岩画群，其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有的是鹿，有的是古代车辆，有的是虎牛咬斗，有的是宗教场景等。而这些岩画所表现的内容及其制作特点与蒙古、中亚地区岩画表现的内容相似。阿勒泰地区发现的不少铜器与乌鲁木齐、哈密巴里坤等地发现的铜器一致，例如巴里坤出土的铜器，其造型、腹部图案等均与阿勒泰地区发掘的一致；另有铜镜也是如此，反映出其同属一样文化圈的特点。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伊犁河、伊塞克湖、天山北部、天山中部和东部流行的塞人一匈奴文化，曾受阿尔泰—南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而后者又受到中原地区殷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具有鲜明的多元文化融合特征。

阿尔泰语系是世界上重要的语系之一，也反映出该地区古代人群和文化交流与融合。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一通古斯语族，其形成是丁零、东胡和肃慎等族系语言早期接触所致，反映出古代北方诸族以及语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十分深入，从而使阿尔泰语系诸语族产生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表明其相互间深刻的联系，昭示着阿勒泰地区人群与文化的广泛交流与深度融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新疆研究室主任）



奥运会是现代体育层级中的“金字塔”，尤其是夏季奥运会，独占体育重大事件中的“巨型事件”层级。现代奥运史是一部法国体育外交发展战略的变迁史，它见证了法国体育在早期国际奥委会中具有绝对话语权，以及顾拜旦卸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的失势，再到实施新体育外交政策之后重获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历史进程。

法国人顾拜旦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起人，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作出杰出贡献。他从小深受普法战争失败的影响，认为法国失败的原因是其教育体系与德国和英国不同，缺乏对体育和身体技能重要性的认识。复兴奥林匹克运动实际上是由三幕构成的一部体育外交剧目：第一幕是 1889 年 6 月顾拜旦和时任法国公共教育部长西蒙组织召开的“在教育中推广体育锻炼国际大会”；第二幕是 1892 年 11 月顾拜旦在法国田径运动协会联盟庆典闭幕式上发表《重建奥运会》的演讲；第三幕就是 1894 年 6 月巴黎索邦的“重建奥林匹克大会”（即国际奥委会成立大会）。

国际奥委会成立大会实际上是该组织早期国际话语权的“确认”大会。但作为体育重要一极的德国代表并未受到邀请，英国代表畅想着泛英帝国运动会，比利时代表因为自身有强大的体操联合会而对这一会议怀有敌意，俄罗斯代表表现冷漠，好在还有美国、瑞典和匈牙利代表的支持，并且会议超过半数以上的代表来自法国。大会充分尊重古代奥运会的历史，将首届现代奥运会放在希腊雅典举行，但即使心怀世界主义的顾拜旦也难免带有“私心”，他希望奥运会成为法国提升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重要中介。因此大会最先明确的是世纪之交的 1900 年巴黎奥运会，并且希望能够借助同年举行的巴黎世博会扩大影响力。顾拜旦坚决拒绝了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关于奥运会永久在雅典举办的要求，后来又拒绝承认希腊 1906 年举办届间运动会的合法性，这才保证了奥运会日后的长久性和普遍性。国际奥委会的早期运作，充分凸显了以法国和法语国家为代表的权力中心区在奥运会事项上的重大话语权。

但 1900 年巴黎奥运会完全被巴黎世博会的光芒所笼罩。这届赛事不仅赛期冗长达数月之久，设项繁杂且怪异，而且由于参赛者水平参差不齐、组织混乱，成为历史上最“失败”的奥运会之一。奥运会刚刚结束，顾拜旦就决心在自己任内让巴黎再次主办奥运会以一雪前耻。1920 年，顾拜旦利用个人在国际奥委会中的话语权，确定巴黎于 1924 年主办第八届夏季奥运会，并成为首个第二次主办奥运会的城市。相比 1900 年巴黎奥运会，1924 年巴黎奥运会可以算作“巨大”的成功，为之后举办的多届奥运会设立了相对清晰的“标准”。根据每主办一次奥运会即增加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惯例”，法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话语权得到稳步提升。

与此同时，法国还通过积极组织创建其他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深涉体育媒体领域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体育国际话语权。当代世界体育地缘政治由国际奥委会、各个国际体育单项组织和各国国家奥委会三个主要参与者 and 一些“卫星”组织构成。其中，国际奥委会是“控制塔”，由它来自我赋权并且控制着其他各个组织的组成。在国际奥委会成立之前，国际体操联合会已于 1881 年成立。之后十几年间相继以法国人为核心成立的国际自行车联盟（1900 年）、国际足联（1904 年）、国际汽车联合会（1904 年）、国际射击联盟（1907 年）等国际体育单项组织，大都与国际奥委会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留协会的法语名称并将法语作为第一官方语言。

而法国在体育媒体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几乎能与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相匹配。1905 年，法国体育记者协会在巴黎成立。为了配合 1924 年巴黎奥运会的举行，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于当年 7 月 2 日在巴黎成立，全世界 144 名体育记者共同见证了这一组织的诞生。至今，法国在该协会中的国际话语权还是很难撼动的。法新

法国体育国际话语权嬗变

□ 魏伟

社是国际奥委会早期认可的三大国际通讯社之一，与美联社和路透社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报道为主不同的是，法新社的奥运报道更具备全球特性。

1992 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后，法国已经主办五届奥运会，包括两届夏奥会和三届冬奥会，但是法国对主办奥运会的热情和传统并未消减。在 21 世纪初屡次“申奥”未果之后，法国政府开始调整体育发展战略，在萨科齐总统卸任、奥朗德总统上任初期对法国体育外交和体育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2014 年 1 月，法国外交部提出了一揽子有关“体育外交”的计划。“新体育外交”作为法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外交政策的一个成熟工具。除了法国运动员的表现，体育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等许多领域创新和国家技术的绝佳展示”。

2014 年起，法国体育大使一职开始设立，该职务直接隶属于外交部，认为体育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法国在原有基础上试图“培育”出一批在国际体育领域享有重要话语权的体育界人士。法国新体育外交战略的制定被称为“法国国家机器的一次文化革命”，其核心是通过举办体育重大赛事来提升法国、法国文化和法语的国际影响力，通过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来配合国家形象的重塑。通过主办包括 2016 年欧洲杯、2019 年女足世界杯、2023 年橄榄球世界杯、2024 年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在内的一系列体育重大赛事，加上传统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环法自行车赛、勒芒 24 小时耐力赛、旺代环球帆船赛等，法国的国家形象、体育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再次得到相应提升。

截至 2023 年，有 13 个国际体育单项组织由法国人担任领导。2030 年冬奥会确定在阿尔卑斯地区举办，这是法国继 1924 年夏蒙尼、1968 年格勒诺布尔和 1992 年阿尔贝维尔之后第 4 次举办冬奥会，加上巴黎举办过的三届夏季奥运会，法国是除美国之外举办奥运会次数最多的国家。法国新体育外交寄希望“法国体育”这张名片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与法国美食、美景和法语等量齐观，同时倾力打造的巴黎“世界体育之都”也会因为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留存下的集体记忆，而在现代体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国际体育传播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大地湾遗址：揭开甘青地区文明起源的面纱

□ 苏海洋 苏逸云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邵店村东侧清水河谷阶地及南岸巨大的簸箕形山坡上，总面积约 110 万平方米，当地人把这种中部略向内凹、坡度较缓而且宽阔的黄土地貌叫“大地湾”，遗址因此得名。大地湾遗址距今约 7800—4800 年，可划分为五个文化期：第一期属大地湾文化，第二至四期属仰韶文化早中晚期，第五期属常山下层文化，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大地湾遗址是我国罕见的经过科学划分和发掘的、跨越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型遗址，为甘青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

见证中国北方从采集狩猎到早期早期农业经济的演变。大地湾遗址是目前我国北方位置最靠西的早期旱作农业栽培与驯化中心，因位于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过渡地带，生态环境脆弱，其不同时期的经济形态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

距今 6 万年时，大地湾遗址区域气候湿润，动植物资源丰富，即使完全依赖简陋的石英石片或碎屑工具进行采集和狩猎活动，先民仍然能过上较为稳定的生活。距今 4.2 万至 3.3 万年间，气候环境恶化，食物极度匮乏，人口数量减少，石制品数量急剧减少。距今 2 万至 1.3 万年期间，随着气候条件改善，大地湾出现了一种用玉石打制、可以装骨柄和木柄的细石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由此进入更为先进的采集狩猎经济阶段。距今 8500 至 7700 年，陇西黄土高原进入 1 万年来最为温暖湿润的阶段，大地湾一带由高级采集经济向早期栽培经济过渡。1980 年，在大地湾一期遗址灰坑中发现了 8 粒黍的米粒。经科学家测定其与现代籽粒仍有较大差距，说明当时该地农业尚处于初始

阶段，经济形态仍以采集和狩猎经济为主。距今 7000 年以后，随着气温和湿度的相对下降和人口压力的增加，单纯仰求于自然的生活方式逐渐难以维系，至仰韶文化晚期（距今 5500—4900 年），以种植黍和粟为主的农业经济成为当地先民经济生活的主体。

大地湾遗址分别呈现了中国北方原始采集狩猎经济、先进采集狩猎经济、早期栽培经济与相对成熟农业经济 4 个不同发展阶段，不仅完整记录了所在区域距今 6 万年以来由采集狩猎经济逐步向农业经济过渡的人类活动历史，而且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北方从采集狩猎经济到早期旱作农业经济的演变过程。史前农业取得显著发展是中华文明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大地湾遗址中早期旱作农业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则为甘青地区文明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大地湾四期已处于部落向国家的过渡阶段。大地湾四期（距今 5500—4900 年）聚落从河边阶地向山地急剧扩展，主体部分面积达 50 万平方米，几百年时间内规模扩大了 10 多倍。对称结构、圈层状结构是此阶段聚落布局最大的特点：聚落主体部分在山上，以 V 区 F400、F405 和 X 区 F901 面积达 200 平方米以上的原始宫殿式建筑连线为对称轴，两侧至少有 7 个或 7 个以上的生活区。已经挖掘的 V 区和 X 区为宫殿区，为整个聚落的核心区；IX 区为生活区与手工作坊区。山下半部分 I、II、III、IV 和 VIII 区为农耕地，属于边缘区。

其中，F901 是一座占地 420 平方米、保存较完整的多间复合式建筑，它是大地湾遗址中面积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房址。据测算，建造这样的建筑需要 100 个青壮劳动力 382 天持续不断的劳动才能完成。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公

共权力，修建如此规模宏大、工程浩繁的建筑是难以想象的。建筑主体部分由主室、后室、侧室构成，主室前面连接敞篷式建筑，它们的功能分别相当于古代官殿建筑的堂、室、旁、夹和轩。在主室内中部偏前，与正门相对并与正门同处于南北中轴线上，有一个由泥圈围成的高于地面的蘑菇状灶台。《礼记》上说：“燔柴于大坛，祭天也；瘞埋于大折，祭地也，用骍犂。”蘑菇状灶台就是《礼记》里说的“大坛”，是燃烧祭天的圣火的祭坛。主室内出土一套量器，由条形盘、铲形杵、箕形杵、四把深腹罐组成且有准确的换算比例，这套标准量器是 5000 年前统一量制产生的见证；后室 3 件粗大的陶缸可能是用来盛装征收来的谷物的，是税收制度产生的肇始，是人们的行为规范被制度化的物证。主室前面连接的敞篷正是古代文献所说的“轩”，“堂”前设“轩”的格局，有“天子临轩”的意味。西侧室中发现 11 件叠在一起的大小相近的红陶钵，正如考古学者赵建龙所说，“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这里集会并就餐的人，至少有 11 个之多。他应该代表 11 个小部落的首领。也可能是它管辖的 11 个村寨的首领”。可见，F901 建筑是一处部落会堂，为大地湾乃至清水河沿岸原始部落的公共活动中心。

大地湾四期发现的宏大聚落，突破了原始村落限制，通过天的祭祀和统一的量制等，将分布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血缘关系和信仰的人群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同时也产生了社会阶层初步分化的



从考古看文明